

忆邓拓同志对我国古代书画和 文献的研究及收藏

丁一岚 刘孟洪 刘永成

目的是为了抢救

一九六一年，邓拓同志在北京一家古画店，发现了一幅画有潇湘竹石的图卷。我国湖南零陵以西，为潇湘二水合流处，历代诗人、画家，或亲历其境，目睹山川形胜；或耳闻而神往，多有吟咏、绘图。这一幅图卷，即以潇湘竹石为题而作。展看全图，隽逸之气扑人，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石头，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渺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潇水相会，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画法也不同于一般山水作品，有极大的创造性。画石用飞白笔法，画竹用楷书及行书撇、捺、竖、横等笔法，而稍加变化，画烟水、云山、远树则用淡墨点染，气韵生动。引人注意的是，画末题有“轼为莘老作”五字。图卷后更有历代题跋文字三千余言，凡二十六家。题跋最晚的时间截止于明代嘉靖辛酉，即公元一五六一年，其中有许多名家笔墨，如元代福建十大

才子之一郑定，以草书写七绝一首，诗曰：

“苏老才名垂古今，人间遗墨若南金。
山云挟雨溪头过，石山琅玕起夕阴。”

又如明代著名学者吴勤，洪武初试经学第一，除武昌及开封府教授，门生满天下，写字有晋人风格，也在卷后题诗一首：

“坡仙昔在黄州时，居闲每访孙莘老。
竹石曾将写赠之，遗墨到今真是宝。”

明代历任工、户、吏三部尚书的夏邦谟，在题诗中就潇湘景色的形象描写，说到：

“东坡逸迹天下奇，竹石点染潇湘姿，
恍惚二妃倚薄暮，林间或有泪痕垂。”

从整个图卷与题跋，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极有可能出自宋代大才子苏东坡的手笔。邓拓同志深为这幅画所吸引，在画前徘徊凝视，不忍离去。画店的营业员告诉邓拓同志，这幅图卷经画店收购得来以后，曾请国家有关收藏部门派专家鉴定，认为并非东坡真迹，因此价值不大。画店的同志无力辨别真假，如果加以一般处置，实在可惜。留在店里不行，因为怕积压资金。不留吧，又怕确是珍品，再遭流失。邓拓同志考虑再三，决定自费收购，留待鉴别。

这一幅潇湘竹石图卷，究竟是苏东坡的真迹还是伪作，确实是一件疑案。但是有关专家已经明确结论，肯定它是假的，而且

拒绝收入国家库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邓拓同志为什么要自费收购下来呢？我们用这样的问题请教于邓拓同志，邓拓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说：“目的是为了抢救。”

邓拓同志告诉我们，无论在中国和外国，历代都有许多收藏家，他们的活动对于各国人民的文化和艺术事业，直接发生积极的影响。远在二千多年前的秦代，中国的历史文献曾经遭受了一场浩劫，当时除了医卜种树之类的书籍以外，各种经籍和各家著作都被秦始皇下令焚毁了很多，后来项羽又火烧咸阳宫殿三月之久，把大批文献和档案也都烧毁了，但是民间有许多收藏家秘密把古籍保存下来。古文的《尚书》、《礼仪》以及《礼记》等书，都是在民间保藏着的。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并不只是封建皇室和贵族官僚有能力收藏各种文物，民间的一些收藏家，不避兵火搜剿，反倒苦心经营地保存了许多精美的文物，清初河北民间的大收藏家梁清标，在这一方面就有很大的贡献。邓拓同志说，在外国，历代收藏家的活动也很普遍。他们有的收藏古籍信札，有的收藏名画、古器，有的收藏邮票、商标。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有一位教授曾把他收藏的许多珍贵绘画，稀有书籍，作家手稿等全部献给了苏维埃政府，其中有画海的名作家阿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二十四幅，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书信，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手稿等。由此可见，不论是那一个国家，那一个民族，民间的收藏家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当然，在收藏文物的过程中，难免鱼龙混杂，就有一个区别真伪的问题。其实，这并不是坏事，你说它假，我说它真，就需要摆出道理，就要下功夫。在国外，至今对达·芬奇的某些画，莎士比亚的剧作，不是都有争论吗？有争论，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探讨，使研究更加深入，这也是百家争鸣嘛！争到最后，总会有个结果。没有结果也不要紧，可以存疑。如果仅仅由个别权威人士武断地

做出宣判，反倒不好，因为很可能把一些名贵的珍品判处了“死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对某些珍品也是一种抢救。

邓拓同志的一席谈，顿时使我们豁然开朗。我们问邓拓同志：“潇湘竹石图真是苏东坡所作吗？”邓拓同志说：“一时很难说，研究研究看看吧！”

邓拓同志的时间是安排得很紧的，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他都要处理大量的工作，亲自接待来访，勤奋读书写作。然而他仍然抽出了业余的业余时间，对潇湘竹石图卷做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时隔半年，他终于得出结论：潇湘竹石图确实是苏东坡的作品，是真迹，而不是伪作。他把研究的结果写成《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连同画卷发表在一九六二年第六期的《人民画报》上，邓拓同志对于这一幅画的考证，言之有物，论据充分，令人信服。由于苏东坡的学问、事业、文章、品行及一生遭遇，彰彰垂于青史，人所共知，然于诗文以外，东坡之画流传绝少。东坡的潇湘竹石图卷一经发掘披载，立即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注意，反响强烈。尽管邓拓同志由东坡之为人，东坡之交游，东坡之经历，东坡之心境，东坡之擅长画竹，画石，东坡之文章风格及古朴字体，并纵论各家题跋，提出了难以辩驳的依据，但他在文章的最后，还是谦虚地写道：“现在东坡作品已经摆在大家面前，就此进行多方面分析研究还是刚刚开始，有待于文物鉴赏家、文艺评论家、国画家、收藏家及其他热心人士，共同努力考证、解释，更进一步接受这一份珍贵之文化艺术遗产。”

一幅九百年来的伟大作品，辗转流传至今，终于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被邓拓同志抢救保存下来了，这确实是一大幸事，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无私的奉献

邓拓同志长期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他同时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书法家，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他对我国历代文物书画，不但是鉴赏家，也是热心的收藏家。以绘画为例，他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据他自己说，他在年青的时候，因为研究中国历史，接触到许多美术方面的史料，那时，他对我国历代绘画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解放以后，他曾因工作劳累过度，患有严重的偏头疼，每当病情恶性发作，读书都有困难。他又不甘心白白把时间浪费掉，于是把欣赏和研究我国历代绘画来代替读书，那知越钻越深，兴趣越来越浓。

邓拓同志曾经风趣地说：“从事画的研究，好处很多，一能丰富知识，二能开拓眼界，三能振奋精神，四能治疗偏头疼。”他说：“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水平是很高的，但如果只从艺术角度去看，还远远不够。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绘画本身就是活的历史教科书。因为画面反映的，是当时当代不同阶层人物活生生的写照，是社会状况的缩影。当然，也体现着画家本人的精神境界和艺术风格。由画面再及于所用绢丝、纸张、墨质、颜料，还可以考察出生产力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真是一‘研’多得啊！”

邓拓同志为便于进行画的研究，逐步开始个人藏画。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藏画数量不多，但凡具有特色的不同画派的作品，都有所收藏，邓拓同志收藏古画，始终坚持以下原则：

一、凡国家需要的，他绝不做收藏；

二、凡属于争论较大的作品，国家文物部门不肯接受的，尽可能加以收集保护；

三、凡个人收藏，都用自己的钱，决不动用半文公款。

邓拓同志收藏文物古画，用的是自己的工资，包括几乎全部稿费。他写作《燕山夜话》，共得稿费二万多元，全部拿来购买文物和古画了。邓拓同志由于搞收藏，个人没有存款，手头经常拮据。有的朋友劝他要给孩子留点钱，他说：“孩子将来可以自立。”他还说：“我搞个人收藏，并不单单出于个人爱好，也不把它当成财产，到了一定的时期，自然捐赠国家。”

邓拓同志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一九六四年，他将个人所收藏的最好的一批古代绘画共一百五十四件，整理得清清楚楚，裱糊得干干净净，开列出目录清单，注明白年代作者，无偿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其中宋画五件，元画九件，明画三十五件，除有经邓拓同志抢救，极其珍贵的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外，还有我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一的徐渭（文长）、朱耷（八大山人）的作品，有明代四大家沈石田、文征明、唐伯虎、仇十洲的作品。这些捐赠的藏画，有手卷，有册页，有立轴，有中堂，全系名家手笔。有些画是邓拓同志极其喜爱，一向珍如拱璧的。如元代倪云林的鹤林图，黄子久的山水立轴，梅道人的梅竹图、墨竹图；明代徐渭的花卉手卷，沈石田的山水图卷、萱草葵花图卷、万木奇峰图、鸡立轴，文征明的山水立轴、山水中堂，唐寅的山水立轴，仇十洲的采兰图，陈道复的四季卉手卷，李长蘅的仿古山水四帧卷，马湘兰的兰花图，陆象山的花鸟中堂；清代石涛的山水册页、山水中堂，罗两峰的墨兰册页、鬼趣图、麻姑图，八大山人的双鹤图、芦雁图、竹石图、鱼图，新罗山人的仕女图、花卉中堂，郑板桥的兰竹图、石虎图，李鱣的公鸡图，黄慎的苏武牧

羊图，陈洪绶的人物立轴，周璠的墨龙中堂、进酒图，恽南田的淡色山水等等。

建国以来，向国家这样大量捐赠珍贵的个人藏画，据文物部门反映，是很少见的。而这些画作的收藏，都是邓拓同志用个人劳动所得换来的啊！

邓拓同志曾经藏有一幅公元十世纪五代南唐大画家周文矩所绘的太真上马图(图一)。这一幅画，也曾被国家有关收藏部门的同志判为伪作。邓拓同志经过仔细研究后，从各种历史记载，从周文矩的师承流派，行笔技法，装点设色，绢丝质地，都考证是周文矩的真作。他把自己的考证结论写成文章，连同原画发表在一九五九年第八期的《中国画》上。只是由于对这一幅画作的看法还有不同之处，邓拓同志才继续把它留在手边，打算再作进一步的探讨。不曾料想，文化大革命的突然来临，使他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令人气愤的是，当邓拓同志的收藏文物全部被抄以后，这一幅珍品竟被林彪窃为己有。林彪抄去邓拓同志的文物书画共达二十二件，仅字画即占十一件，紧跟林彪之后，陈伯达、江青、姚文元、黄、吴、叶、李、邱以及那个顾问之流，都纷纷把黑手伸向邓拓同志历年的珍藏，他们把许多宋、元重要古籍抄本随意拿走。尤其为人不齿的，不学无术的江青，在抄走许多重要文物的同时，还特意抄走并无多大价值的《清代帝王后妃年表》一件，可见其野心之一斑。

多么鲜明的对比！邓拓同志的个人收藏，是为了研究，是为了抢救，是为了经过系统的整理，然后无私地奉献给国家，奉献给人民。何等的高尚！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之流，却是趁火打劫，鼠窃狗偷，用“破四旧”当幌子，来满足一己的私欲。何等的卑劣！

京西煤窑和“六必居”

邓拓同志对于我国历代绘画、书籍的收藏，是花费过很多心血的。但他并不仅仅从事于书画的收藏，他对我国历代文物，特别是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也有着杰出的贡献。

邓拓同志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在条件十分困难的革命根据地，还是在政务繁忙的首都北京，他都不遗余力关心着历史文物、文献的保护、研究和搜集。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邓拓同志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的时候，就非常重视对当地的历史文物、文献和古迹作调查。他曾多次跋山涉水不辞辛劳地搜集到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文献。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这批文物、文献随大军进城运到北京，后来妥善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解放后，邓拓同志在《人民日报》和北京市委工作期间，一如既往十分关怀历史文物和文献的保护和搜集工作。正如他在《保护文物》这篇文章中所说：“多少年来，这里（北京）所有的珍贵文物，不知遭受了帝国主义强盗、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奸商等等的多少摧残和破坏。如今剩下的这些，更加值得我们予以保护。”因此，他大声疾呼：“希望首都各方面关心祖国文化遗产的人们，都来认真执行国务院的规定，进一步注意保护这些文物吧！”邓拓同志经常向干部、群众，进行保护历史文物、文献的宣传教育工作，并且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邓拓同志对北京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物、文献可说是了如指掌，许多遗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抢救历史文物、文献的动人事迹，

还历历在目。邓拓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之暇，曾多次亲自去京西门头沟矿区，发掘出明清时期有关京西煤窑业的大批文书契约。同样，他对北京前门外一家老酱园铺“六必居”和崇文门外一家老国药店“万全堂”的采访，获得了有关这两家铺店的大批历史资料。

在这里，我们想着重谈谈邓拓同志对京西煤窑和“六必居”文献资料的发掘、搜集和整理。

先说京西煤窑。邓拓同志在研究历史方面，是着重研究明、清史的。他认为我国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是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过去，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的问题，有些人只是依据某些史书的片断的记载，就做出了自己的论断。例如，有的人仅仅依据徐一夔著的《始丰稿》卷一中的《织工对》一节，就得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始于元朝至正年间的结论。邓拓同志以为，这种“离开了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大量的材料的研究，孤立地观察某一个别现象，是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的”。邓拓同志研究历史，从来尊重史实。他格外注重于活的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为了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问题，他曾亲自到京西门头沟矿区，做了实地的采访。

邓拓同志在门头沟发现了明、清两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百座民窑的遗迹，并收集了它们的大批契约文书，其中截至乾隆末年为止的共有一百三十七张，另有民窑文约登记本和账单各一，民窑业主的家谱一册，民窑手执的诉状两张和一个抄本，窑图两张。他还访问了许多老窑主。邓拓同志依据这些活的材料，又与史籍的记载加以对照，判定门头沟民窑兴起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的乾隆年间大盛起来。他综合研究了京西民窑的这批文书契约，分析出明、清两代私人开采的民窑是一种分股合伙的形式，而且一开始就采取了雇佣劳动，进行着商品生产，并逐渐形成了新兴工商业小市镇；信用制度，如汇兑和支票手续也日渐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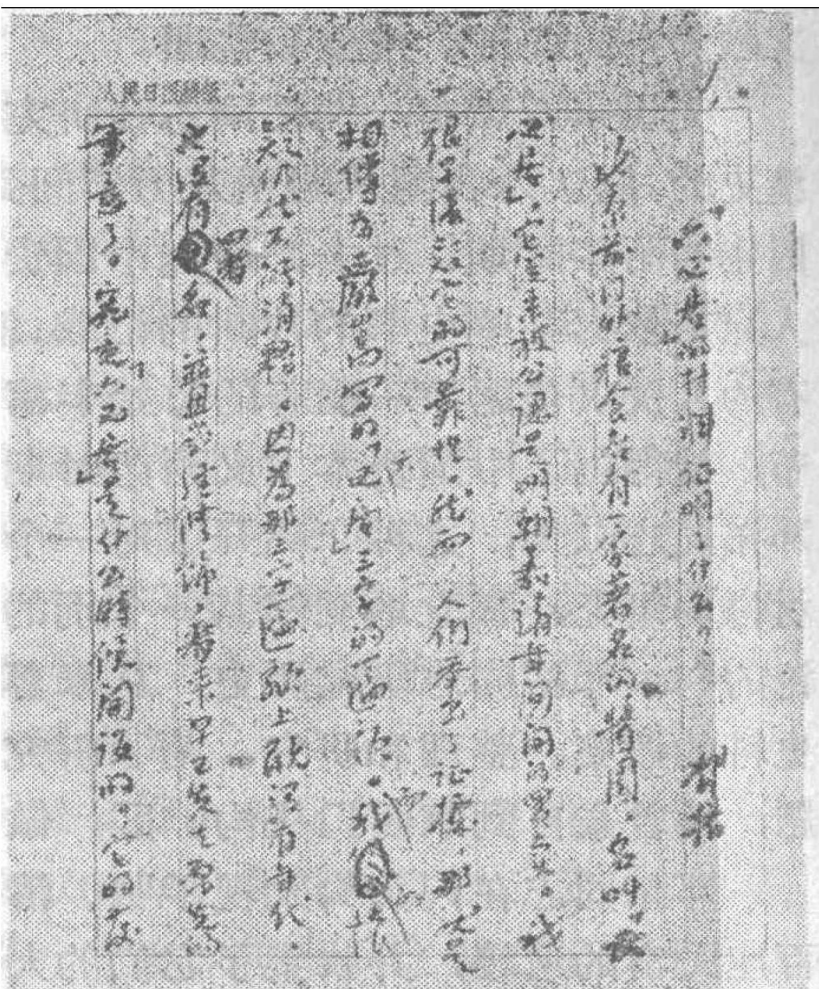
行。邓拓同志把他研究的结果写成《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邓拓同志对“六必居”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事例也是很动人的。“六必居”是开设在前门外粮食店街的一家酱园，它所生产的酱菜，是北京的名产之一，尤以黑菜、包瓜、八宝菜驰名中外。曾有竹枝词一首形容“六必居”

的酱菜：“黑菜包瓜名不虚，七珍八宝样多余，都人争说前门外，四百年来六必居。”

邓拓同志为什么这样重视“六必居”呢？因为“六必居”的开设和它的发展过程，同京西煤窑一样，对于明、清时期北京地区工商业发展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邓拓同志亲自采访过“六必居”的老夥友贺永昌老先生，并且从他那里搜集到“六必居”的旧房契

九张，根帐一本，众支使银帐一本，财东赵宅支银帐一本，取房租帐一本，收买六珍号银帐一本，收买源升号家伙帐一本，房租摺两本，另有临汾会馆碑文墨拓五张。邓拓同志对这些资料做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并着手写《“六必居”的材料证明了什么？》一文(图二)。他在文章的开头，首先对“六必居”是公认的明朝嘉靖年开的买卖提出了疑问。他认为仅以相传为严嵩所写的“六必居”三字的匾额，就断定“六必居”开设的年代，并不足以为凭。因为这个匾额



图二 邓拓同志撰写的“六必居”文稿

上既没有年代，也没有署名，并且几经修饰，早已失去原先的笔意。他在列举了他所搜集到的资料清单以后说道：“这些材料最早的是清朝康熙十九年的，再没有更早的了。很可能在明末清初变乱之中，最早的材料失落或毁坏了，或者是有别的原因也未可知。”邓拓同志在文中，由最早的一张房契开始，一直抄录到“六必居”根帐部分。可惜的是，由于其他工作的耽搁，这篇文章他并没有写完，现在只剩下了他的未完成的手稿前半部分。从他留下的这份不完全的遗稿，我们可以看出，邓拓同志是多么重视历史文献的探索和搜集，他的治学态度是多么的严谨。

邓拓同志还谈到过挖掘埋藏在北京西城某中学操场下面的一批清代工商业碑石的计划。这个计划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未能实现。为了抢救和保护这批重要的历史文物，也为了实现邓拓同志的遗愿，我们建议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应将这批至今仍埋在地下的碑石尽早地发掘出来，让它直接为科研工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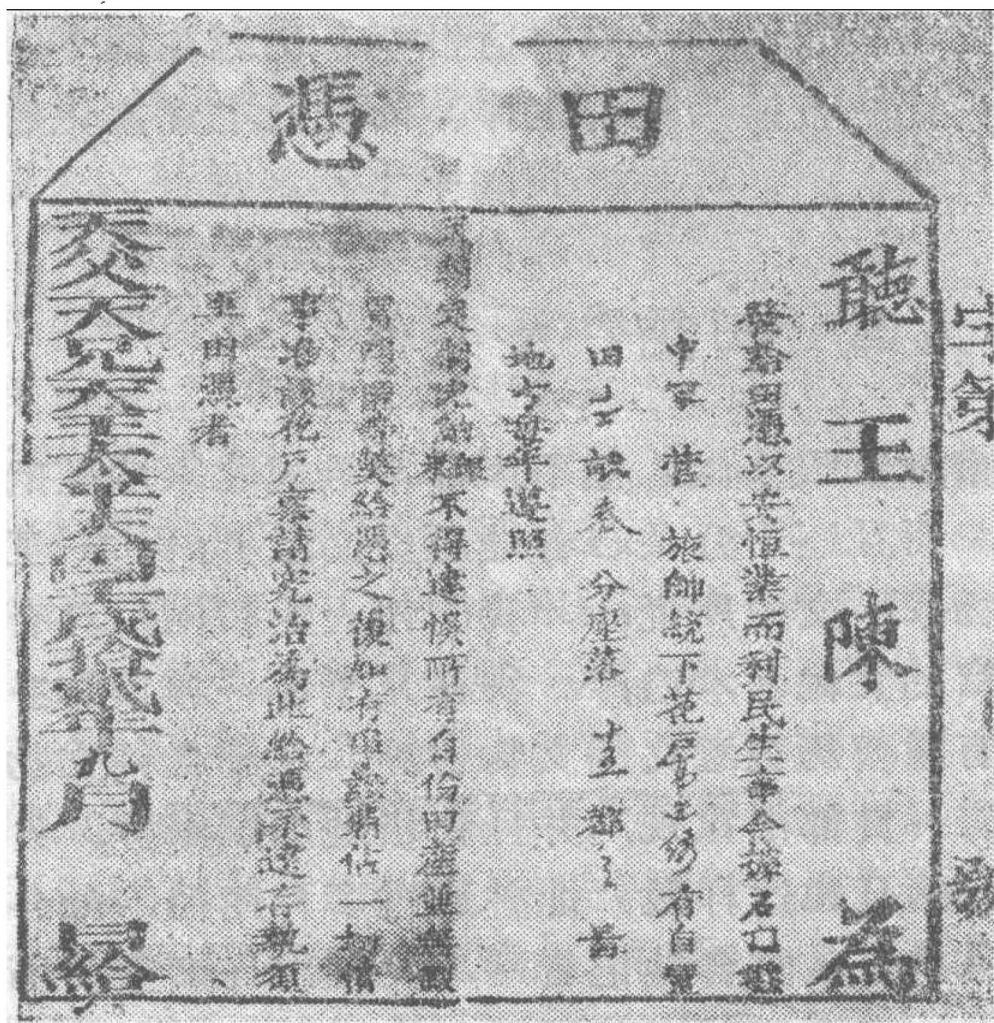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田凭”及其他

邓拓同志胸怀北京，放眼全国。他不但非常重视北京地区的历史文献保护与搜集，而且还十分关心各地历史文献的保护工作。亦如他在《保护文物》一文中所说：“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无限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现在几乎每一城市和乡村都可以遇见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古迹。对于各种文物古迹，我们的人民政府一贯都很重视，并且积极地加以保护。”邓拓同志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他曾通过多种途径，如各地文物部门，或《人民日报》驻各地记者站，发掘出许多重要历史文献。在这些文献中，有明清时期关于四川自贡井盐业、云南

个旧铜矿业、广东商团事件和太平天国的重要实物资料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至今尚未发表过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实物四件：两件“田凭”，即一八六二年听王陈炳文发给浙江石门县花户高廷绣和福宿的“田凭”；一件是同年忠孝朝将邓光明发给子民金坤书的“完银串票”；另一件是一八六三年归王邓光明发给花户六延昶的“预知由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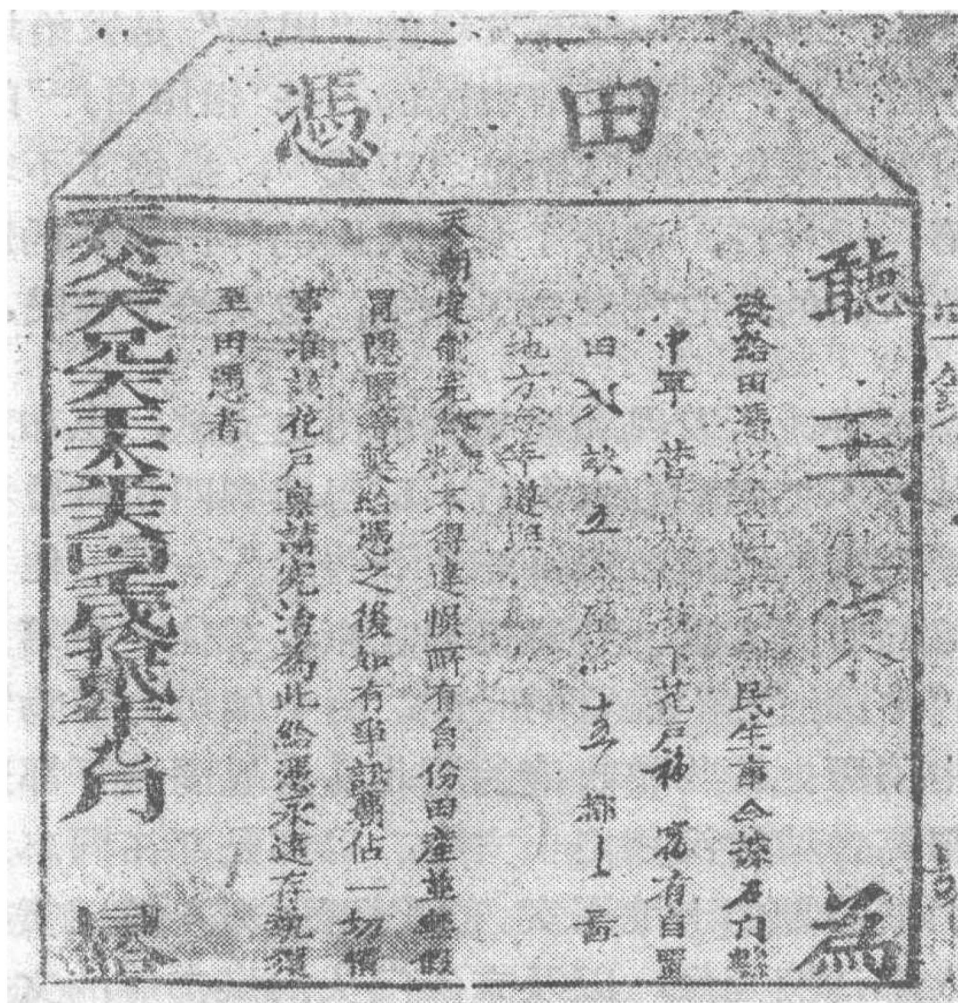
据有关同志考证，邓拓同志发掘和收集的这四件文献，是研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重要史料。例如，太平天国的“田凭”保存至今的为数甚少，据现已发现和发表在《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及其续编、补编所载者，加在一起总共也不过只有四件，再加一件“荡凭”也只有五件。现在却又增加了二件。这二件“田凭”格式如下：（图三、四）



（图三）高廷绣
“田凭”：

说 明

原件高三六公分，宽二八·五公分，竹纸墨印，墨笔填写。在年月日上盖有“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开朝励臣嶠天安张世发”长方大朱印。



(图四) 福宿“田凭”：

说 明

原件高、宽及年月日上所盖长方大朱印均同于高廷绣《田凭》，亦朱纸墨印，墨笔填写；但在第五行“遵照”字样下盖有“李查过”三字竹印。

从以上两件“田凭”，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有的同志认为，这两件“田凭”不仅充实了太平天国“田凭”的数量，而且比原来发现的四件田凭，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田亩的数字比较小。原发现的“田凭”，田亩数字最高者为十八亩，最低者为四亩四分八厘。而新发现的这两件“田凭”，田亩数一为二亩五分，一为一亩三分。这说明它们代表的是太平天国

的另一种类型的“田凭”。原有发现的“田凭”是发给地主的；现在发现的“田凭”，则是发给农民的，是“祖田自产”的那一类型的。邓拓同志所搜集到的这两份“田凭”，提供了不容置疑的太平天国的第一手材料，确证了太平天国的“田凭”的颁发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它既发给了地主，也发给了农民。

邓拓同志对待他所发现和搜集到的历史文献，也和对待他的藏画一样，从来不把它们独自占有。记得他到四川时曾看见了一份原存巴县档案馆的“清政府杀石达开告示”一件，他认为这是一份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特意借来北京，在他主持筹备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展览的时候，由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展出。另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河北易县战国燕下都遗址出土文物和山西阳高古城村汉墓出土文物，也都是邓拓同志亲自搜集的。其它如明清时期的土地买卖，租赁契约，车厂揽运货物合同，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画像，以及京西门头沟煤窑业的文书契约等等重要历史文物，邓拓同志都慨然捐献了出来，充实、丰富了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内容。再如，一九六三年，当邓拓同志得知历史研究所正在从事《中国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时，便毫无保留的将自己收藏多年的一批珍贵的甲骨片提供给历史所利用，还热情地接待了负责这项工作的胡厚宣同志。邓拓同志这种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和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图一 太真上马图

唐 周文矩 绘